

胡蘭成文化理念的踐行與失敗

——以臺灣《三三集刊》為中心的考察

金進

摘要：1974年5月，胡蘭成應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之聘來台任教，1976年11月8日被逼離開臺灣。1977年4月20日（三月初三）“三三”成立，胡蘭成以通信方式鼓勵朱天文創辦刊物，朱天文、仙枝等人共同主編三三集刊，1978年10月，胡蘭成以“李磐”為名，自三三集刊十五輯（《日出西山雨》）起，開始為三三撰稿。1981年胡蘭成逝世，《三三集刊》隨即停辦。從三三集刊入手，研究胡蘭成文化理念的實踐過程是一個新的研究角度，本文將從胡蘭成的文化理念內容的內涵以及“三三集刊”所受影響的具體表現形式入手，分析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下，胡蘭成的學說失敗的原因，從而試圖對胡蘭成和三三集刊的文學史地位進行新的評價和定位。

關鍵詞：胡蘭成；文化保守主義；文化中國；三三集刊

1974年5月，胡蘭成入境臺灣，應中國文化大學之聘來台任教，同年秋，開始教授中國古典小說、日本文學、禪宗思想和“華學、科學與哲學”數門課程。在華岡遇到林慧娥（後易名仙枝，時為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二年級學生），其從暑假起就為胡蘭成謄抄文件。1974年8月和1975年9月，朱天文兩度隨父親朱西寧上華岡拜訪胡蘭成，其間曾重讀胡蘭成《今生今世》。1976年4月底，胡蘭成因抗戰漢奸之名被揭發，10

月被迫停課，《今生今世》《山河歲月》被禁。隨後由朱西寧安排避居景美朱家隔壁，此後胡蘭成為朱家姊妹及其文友講經論道，在日常生活裏隨處點撥。因顏元叔、余光中等學者的驅胡行為，胡蘭成終於 1976 年 11 月 8 日被逼離開臺灣。1977 年 4 月 20 日（三月初三）“三三”成立，在胡蘭成的通信鼓勵下，朱天文、仙枝等人共同主編三三集刊。1978 年 10 月，胡蘭成以“李罄”為名，自三三集刊十五輯（《日出西山雨》）起，開始為三三撰稿。1981 年胡蘭成逝世，同年 8 月，《三三集刊》停辦。1989 年三三書坊停止運作。¹名噪一時的“三三集刊”本身包括“三三集刊”二十八冊和“三三書坊”十二冊，其中“三三書坊”中有胡蘭成化名“李罄”所作的《禪是一枝花》（1979）、《中國禮樂》（1979）、《中國文學史話》（1980）和《今日何日兮》（1981）。

朱天文曾經這樣回溯自己的前期創作，“當時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我，……我後來的寫作生涯，整個的其實都在咀嚼、吞吐、反復塗寫和利用這個‘前身’”。²這段時間正好與胡蘭成與朱家結識、旅居臺灣及被迫逃到日本，直至 1981 年去世的時間重合。在這篇文章中，有對“三三”的權威解釋：“三三，具體是有《三三集刊》，在我大學三年級時候創辦的，1977 年 4 月。兩年後我們成立三三書坊。當時胡先生書《山河歲月》在臺灣出版遭禁，刪節出版的《今生今世》也給勸告，既然沒有出版社出胡先生書，我們就自己來，用胡先生在《三三集刊》撰文的筆名李罄，印行出版。這樣一共出版了四本，至胡先生去世的 1981 年。可

¹張瑞芬，《胡蘭成，朱天文，與三三：當代臺灣文學論集》，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 年版。

²朱天文，《花憶前身——回憶張愛玲與胡蘭成》，收劉紹銘等，《再讀張愛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11 頁。

以說，三三是胡蘭成一手促成的。打從結識胡先生，其間有一年的時間胡先生住我們家隔壁，著書講學，然後返僑居地日本，至去世，總共七年。”¹可以說，從《三三集刊》的研究入手，進而研究胡蘭成文化理念的影響和實踐是一個全新的研究角度，本文將從胡蘭成的文化理念內涵以及《三三集刊》所受其影響的具體表現形式入手，分析在具體的歷史情境和文學場域下，胡蘭成的學說失敗的原因，從而試圖對胡蘭成和三三集刊的文學史地位進行新的評價和定位。

一、胡蘭成的文化理念中的保守主義和教化意圖

何謂“三三”？三三集刊扉頁上所寫：“你若認為‘三三’縱排出乾卦，橫排出坤卦，也好。你若認為‘三三’嚮往中國文學傳統的‘興比賦’也好。你若認為‘三三’想要三達德，也好。或者你若認為‘三三’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故事，也好。你若認為‘三三’說的‘三位一體’真神的故事，也好。你若認為‘三三’說的‘三民主義’真理的故事，也好。也許你若認為‘三三’就只是那樣一個‘三三’，也好。‘三三’即尊崇三民主義與三位一體，前者為孫文學說，後者為基督教義。”《三三集刊》本欲取名《江河》，可見其中濃烈的中國意識。三三的精神領袖就是胡蘭成，朱西寧則是背後的支持者。

“胡蘭成著述以作為三三的基本綱領，提供形而上的理論指導，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則、忠君愛國之說、中國傳統士的精神等，都成為三三青年

¹朱天文，《花憶前身——回憶張愛玲與胡蘭成》，收劉紹銘等，《再讀張愛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頁。

朗朗上口的基本教義；而朱西寧議論文多以對應現實，如復興中華文化、批駁鄉土文學等，此外他還做了很多務實工作，包括將居所供為活動場地，及提供物質資助；三三青年在大專院校演講兩百餘場，自動自發、分工合作形成了一套運作系統。”¹臺灣學者范宜文歸納胡蘭成的文化信念，一是“復興中華文化”，二是“遵行三民主義”，三是“批駁鄉土文學”，四是“完成伐共建國”。²但我認為，這份宣言糅雜着文化中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基督教教義的政治/文化信仰，三三成員一開始就陷入到一個龐雜的文化理想圖景中，而文學創作是一種語言和情感結合的藝術，這些矛盾都為胡蘭成文化理念的失敗埋下了導火線。

胡蘭成為什麼能成為三三群士的精神領袖？這是我們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首先跟敗退臺灣之後的國民黨教育政策有關。1949年國民黨當局撤退到臺灣地區，因為戰時環境的限制，在文化方面的建樹不多，很多文化機構都是以“臨時”的形式形成的。加上對中共文藝政策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忌憚和敵意，對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和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都採取禁絕態度，所以文學傳統相當的支離破碎。“正是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薄弱，導致了國民黨當局的文化政策迅速遁入‘大中華中心主義’修辭和帶有新傳統主義色彩的道德主義之中。比如，為了對抗共產主義宣揚的階級仇恨，國民黨的右翼理論家鼓吹‘人性’或儒家思想中的性善主張，然而‘人性’很快就淪為文化官僚口中的教誨性修辭。此外，慫恿知識份子回避赤裸裸的社會經濟問題，把有關‘階級’的討論列為禁忌。諸

¹莊宜文：《朱西寧與胡蘭成、張愛玲的文學因緣》，收王德威等著：《紀念朱西寧先生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3年版，第148頁。

²莊宜文：《朱西寧與胡蘭成、張愛玲的文學因緣》，收王德威等著：《紀念朱西寧先生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3年版，第144-146頁。

如此類的消極策略，多年後終於引發了 20 世紀 70 年代鄉土文學運動那樣的強烈反撲。而與此同時，接受國民黨‘教誨式’意識形態灌輸的知識份子則發展出一套保守的文化主義觀點，廣泛地為佔據主流文學位置的文化參與者所信從。”¹雖然胡蘭成的學說被余光中等人認為是一種反理性的、烏托邦式的文化保守主義，²但因為 1970 年代臺灣文壇右翼化的“文化民族主義”或者“文化保守主義”傾向，胡蘭成的《山河歲月》（1975）中對前現代中國的文化思想梳理正當其道，也因此用這種對前現代中國烏托邦式的召喚吸引了國民黨“文化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下培養的三三群士。其反共言論是非常明顯的，“提到三民主義，我才想起一個疑問必須要澄清，就是馬克思講鬥爭為歷史文明向前去的原因。因為中國人說的反，是從新生出發的，這個反是肯定大自然是善、肯定萬物都是向上、向陽光的，但階級鬥爭則是把表像的對立來渲染作為本質，進而挑撥仇恨，根本上就把這個情分來丟失了，他們不知反是新生的，是為著成全，所以就像陽子沒有電子一般，是成不得和諧光明的天下世界。”³第二點就是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毋庸置疑地說，胡蘭成一直在利用自己張愛玲前夫的身份消費張愛玲，再加上朱西寧父女的崇拜

¹張誦聖：《臺灣文學生態：從戒嚴法則到市場規律》，鎮江：江蘇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 57 頁。

²余光中說：“胡蘭成對於中國歷史，一往情深，對於中國文化，則是絕對信任。可惜《山河歲月》的嚴重缺陷，也因此而來。胡蘭成對於中國文化，只有肯定，絕少檢討。直接間接，他認定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是至上美滿，冠於世界，相形之下，夷狄的文明總有所不足。這種感覺，當做一種愛國情緒來欣賞，也許是動人的，可是當做一種知性的認識來宣揚，則容易誤認。”余光中：《山河歲月話漁樵——評胡蘭成新出的舊書》，收入《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 年版，第 261 頁。

³《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喜反與好玩——三三集刊作家集體討論》，收《三三集刊》（第 9 輯），臺北：皇冠雜誌社，1978 年版，第 230 頁。

心態和努力實踐，也加強著他對三三群士的影響力。

早在抗戰時期，胡蘭成就認為“西方文明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確比東方在同時代的成就更多。但東方文明在已往一切時代中的成就，這樣蓄積而成的傳統，卻是大於西方文明的傳統，也就是所謂民族的本來面目。”¹基本上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傾向。三三集刊中有一組連載了十四輯“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的集體討論，這些標榜“集體討論”的文章，都是對胡蘭成理論的闡發。如第7輯的《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感激大自然》，文章討論的是胡蘭成的《中國文學史話》中“古來中國文學的傳統，第一是感激大自然”這一觀點，文中把胡蘭成化名為“早升旭”這個人物，借這個人物之口來解釋中國文學和西洋文學的傳統：“至於西洋文學呢，就低俗在他們有人事而沒有天意。西洋的古代文學沒有寫自然風景，近世的有寫自然風景，像托爾斯泰寫俄羅斯的大雪曠野中的馬車，英國王爾德童話中寫月光。但都是只寫了物形，沒有寫得大自然的象，那情緒也是人事的，不曉得自然是無情而有意，所謂天意。”²之後，三三群士，分別化名為“紅玉”、“花皮五爪”、“喇叭三號”探討“人事”與“天意”，不過結果是“眾人紛紛云云，勉強得了一個結論，說天意是包含了人事與神意，而神意就是神意，與人事無關。但這也說到其大小的問題，與神意與天意的根本不同仍舊口齒不清。一夥人便僵在那裡。”（第229頁）這篇討論文章也暴露出胡蘭成學說的漏洞。《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人世的妙相》（第八輯）、《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喜反與好玩》（第九輯）、《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中國文學

¹胡蘭成：《文明的傳統》，收《苦竹》1944年11月第2期，第176頁。

²《三三集刊》第7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7年版，第226-227頁。

的作者》(第十輯)、《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文學與歷史的氣運》(第十一輯)。¹我更願意把這些討論文章看作是胡蘭成獨立撰寫的“文學與歷史”問題專文，這些論文所涉及的文化(文學)觀點凸顯出胡蘭成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

首先是反五四新文化立場。胡蘭成說“‘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後，北京大學一派疑古的新風氣，但是堯典裏所講的星象位置，竟在天文學上得到了證實。而且二次大戰後，地下考古學所發現的美索波達米亞的古文明，更可參照堯典裏的世界，得到新的證實。只是我們的一般學者文人，至今尚以五十年前的顧頡剛的古史辨說禹是一條蟲為新奇，這種無知，是因於其人品低下，喪失民族自信之故。”²對於“春秋戰國是論文的時代”的三個特色的歸納：“其立論的理是依於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演繹而來，乃至如韓非子，也還是有老子的“天地不仁”為其思想，比西洋的法治論高曠。再如孫子，他是一寫就寫出了永遠新鮮的兵法論，德國克勞維茨的軍事學，是把握了現代的技術方面，但在原理上還是不違孫子，不及孫子”；“發明了許多新字新語，一種是用於說明‘無’的，如物象的象，乾坤、陰陽、虛實的虛，與仿佛、窈冥等形容詞，與仁義的仁，禮樂的樂，都是新字新語。”“中國的文章的造型，是有陰陽虛實與位置變化的，只有以這樣形式的，徘徊徐疾，有調而非旋律的文章，才能適合於寫出中國的論文所特有的那種內容，不是西洋那種邏輯體系的報告文學式的文體寫的論文可比，而必然是文學的。”³

¹胡蘭成：《文學與時代的氣運》，《中國文學史話》，臺北：三三書坊，1980版，第77-136頁。

²《三三集刊》第11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年版，第232-233頁。

³《三三集刊》第11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年版，第247-248頁。

第 14 輯《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知性的文學》也是出自胡蘭成的文章，其中對五四新文學不斷進行攻擊和否定。更有甚者，在第 12 輯中，一段“五四在中國文學的一個革命，若非這革命，不會有今天的許多好文章。但是五四犯了三個錯誤：一否定禮教。二否定士。三把文學作為藝術的一種。把文學當作藝術的一種是把文學看小了，其原因見於前幾期的討論文。這裡只說禮教這種東西，就有肯定即妄，宋儒妄到女人不可出門一步，但是五四把禮教給否定了，這又是使人的情義漂失了。禮教只可有更革，但史上每換朝代，頂多也只是改了正朔與服色，沒有改到祭祀與賓主倫常間之禮的。禮儀是中國人情意表現的形式，五四在原則上把禮教打倒了，至少在文學上寫中國人的情意沒有了形式，以致小說裏用了西洋人的情意與動作的形式來描寫中國人，這樣，文學先就不美了”¹，又是把五四運動給否定掉了。

其次是反共立場。第 12 輯《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文學與時代的運氣——三三集刊作者討論會》這篇一看就知道是胡蘭成的文章，與第 11 輯一樣，出自胡蘭成的同一篇論文。在中國大陸版本中，最後一段刪掉了：“今日何日兮？中國的同胞們，隋唐的江山文明，見證了五胡亂華變奏局中，王猛、崔浩、高允、文明皇后的時代的大意願，天道不爽，歷史的氣運興衰有時，中國今日之處境，猶甚于五胡亂華，而國父的革命已邁七十個年頭，中國的前途將往何所？世界的前景又將如何？‘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竟會是一句空話嗎？”在這一段中，一句“五胡亂華變奏局”，就隱藏着濃厚的反共意識。如“三三之士當前的

¹《三三集刊》第 12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248 頁。

目標是在反共，光復大陸，但這必定要有思想。”¹ “我今建議，三三不會音樂的人亦要學會知道樂理，會音樂的人要練習中國的古樂。……今三三的青年有光復大陸、創造新時代之志，即此是學禮學樂的基本。”² 加上在一些對話中，類似“今天共產黨也是落到這裏頭去了，因此即使他們叫罵勞動是神聖的，但同時勞動又拿來當刑罰的工具，想一想就知道這是矛盾的，他們還是把勞動看成受詛咒的，而變本加厲拿來當作今天他們所施行、變相的奴隸制度”³這樣的表達，這些語句都不負責任地把三三諸子的文學實踐直接跟反共掛鉤，也抹殺了三三諸子創作的多樣性。

最後，胡蘭成學說有着明顯的“文化中國”教化意圖。從第 15 輯《音樂論——聲的究極》開始，一直到第 24 輯，胡蘭成直接化名“李磐”來現身說法。他直接指出“三三會寫文章的年輕人今知讀中國的古書與國父全集，這是使創作的前途可以日月長新花長生。……學唱是或昆曲，或平劇，或古樂的頌歌，都可，也必定要練習出正音來。曲調是秦漢至清的郊廟頌樂，與大雅小雅的譜調，以及自孔子的幽蘭操以來的琴曲、宋詞元曲等譜調，與漢魏六朝以來的童謠民歌的唱法與舞姿都講究練習，必定要唱出舞出一個江山風景、英雄胸襟與萬民之情來。”⁴就胡蘭成對三三諸子的影響來看，三三合唱團的建立必然與之有相當關

¹ 《三三集刊》第 13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247 頁。

² 李磐：《音樂論 10》，《三三集刊》第 24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9 年版，第 43 頁。

³ 《三三集刊》第 9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249 頁。

⁴ 李磐，《音樂論 10》，收《三三集刊》第 24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9 年版，第 44 頁。

係。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三三群士之外，三三集刊有一支“文化中國”的外援文學部隊。詩人鄭愁予就是一例，“《衣鉢》系列組詩”¹，由《仰望》、《芥子》、《熱血》、《背影》和《衣鉢》等5首詩歌組成，其旨在悼念孫中山先生，其中《背影》的最後一段：“兩萬人提燈為一個老壯士照路/帶着最後生日的感慨 您將遠行/在深灰的大氅裏 裹着一腔什麼/啊/那是革命的衣服 歷史已預知/當夕陽 浮雕您底背影在臨江的黃埔/那時正是您滿意的訣別/因為 第二代的同志已長成”，聯繫前後文，這其中的“第二代的同志”指的是外省第一代，而《衣鉢》最後一段中的“第三代”指的就是三三諸子，但其中的反共思維是相當明顯的。第十二輯重刊了鄭愁予的《仁者無敵》，“（詩歌）分六節，‘慈母’ ‘祖國’ ‘負重’ ‘功成’ ‘致遠’ 和 ‘誓言’，其中的內容相當空洞，不過也可以從反面看出蔣介石在臺灣的無作為：“當此民族危亡的大難啊您是怎般度過/當太康艦遊弋于滄海明月間/連綿萬里的故國而無一泊地/當部屬不肖 盟友背棄/啊 這般瀕臨絕境豈是凡人所能屈忍得了的/然而 只有經得起最後的試煉/那神的宏恩/只有忍得下最大的屈辱/那道行的力量才能淬發/衰梁雜亂的舊業下毀了/且乘此造起鋼骨渾然的新建築”²整首詩中一味讚美蔣介石的“仁”，可是稍懂歷史的人，就知道蔣介石的一系列罪行，“寧漢合流”後的反革命大屠殺（1928）、抗日戰爭中的消極抗日（1937-1945）、“解放戰爭”中挑起的國共內戰（1945-1949），這些似乎都被當代臺灣主流知識份子遺忘了，有的只是被洗腦之後的“謳歌”。³這些對“中華民國”的悲情回溯，故意營造的沒落朝代的遺民身

¹ 《三三集刊》第11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年版，第124-140頁。

² 《三三集刊》第12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年版，第134頁。

³ 《臺灣省戒嚴令》（正式名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戒字第一號》），是一

份，這些都契合着 1970 年代海外方興未艾的文化中國思潮，支撐着胡蘭成所宣導的文化中國理念。

二、三三群士¹與“張腔”“胡說”² 及他們所受影響的具體表現形式

從整體創作特色來定位的話，三三群士的創作屬於 1970 年代的臺灣校園青春文學範疇。三三群士都是眷村子弟，這些眷村子弟多有軍中背景，這些出身於中上層家庭、相對來說受過良好教育的軍人，形成了臺灣獨特的眷村次文化的骨幹，他們的文化傳統以及文壇地位惠及外省第二代作家，培養了以朱天文、朱天心、馬叔禮為首的三三群士。無論從創作內容還是藝術實踐，再加上他們在校大學生的身份歸屬，其作品中的校園文學氣息是相當濃厚的。“促使早期‘三三社’成員在 20 世紀 70

個於 1949 年 5 月 19 日由中華民國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佈的戒嚴令，內容為宣告自同年 5 月 20 日零時起在臺灣省全境（含臺灣本島、澎湖群島及其它附屬島嶼）實施戒嚴，從戒嚴令頒佈直到 1949 年底，中華民國政府相關單位陸續頒佈了一些相關管制法令。至 1987 年 7 月 15 日由蔣經國總統宣佈解嚴為止，共持續了 38 年又 56 天之久，是世界上持續時間最久的戒嚴。

¹“三三群士”是當時臺灣文化界對三三集刊作者群的稱呼。原文是“自從書坊出了‘中國站起’，文化界的先輩們便開始喚三三的朋友們是‘三三群士’，這讓三三的朋友們又愧煞又驚惶。”仙枝：《三三小根苗》，《三三集刊》第 25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32 頁。

²這兩個詞都是王德威教授發明的，前者原文為“小說界也有張腔，肇始者不是別人，正是張愛玲”，參見王德威：《張愛玲成了祖師奶奶》，收《小說中國》，臺北：麥田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37-341 頁。後者原文“彼時的朱天文還太‘正經’；要再等十年，她才終於把‘張腔’與‘胡說’熔為一爐，從而煉出自己的風格”，參見王德威：《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與“張派”作家的超越之路》，收《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版，第 251 頁。

年代後期和 80 年代以華麗的身姿所展示的文化保守主義，與其說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動機，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年輕氣盛的理想主義。”¹ 這種青春理想主義式的校園文學的表現方式是一種文化中國視野下的文學創作。這些年輕作家，他們都沒有在大陸生活的經驗，小說中的中國並非當時的中國現實，有的是大學校園中的學習生活，有的是詩歌中用文本建構起來的文化幻影，有的是軍中文藝的顛倒歷史的戰鬥。可以說他們將胡蘭成學說中關於中國文化的思考，用記憶和虛構對“文化中國”進行闡釋。三三群士與他們的偶像張愛玲相較而言，“張愛玲那時代的人們比現在的人們多有接觸時勢的感覺，也比較會獨立的思考事情，也比較多讀書。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朱天文的一代年輕人，則惟是趨時尚，而於時勢無感覺，很少會獨立思想，很少讀功課作業外的書，受美國式教育的影響，體格成人了，精神多未成人，每是成人的駭豎。青年作家因為見識不及，根底不夠，多像草生一秋即萎。這點我與朱天文談起，她倒是肯重新用功讀書。知道今是頹廢的時代，即你是可以不受一個時代的限制，而生於許多時代中，生出革命的朝氣的。”² 平心而論，三三的組織結構散漫，他們的組織純粹靠一群文學青年的熱情維持：“三三集刊的籌畫準備，先是策訂下清晰晰的進行綱領，合作而不分工，寫稿、約稿、禱告、拉出版社來支援，每人皆四項工作同時進行，全憑信心，義無反顧，勁頭充足而極為順利。其中只接洽出版社有所曲折，也皆無不好；大多出版社俱乏異想和眼光，是心已死，故不為所動，間有願意支持印行者，不免自認在作極大的施捨或犧牲。……適於此時，皇

¹張誦聖：《臺灣文學生態：從戒嚴法則到市場規律》，第 130 頁。

²胡蘭成：《來寫朱天文》（1976），收《中國文學史話》，臺北：遠流，1991 年版，第 268 頁。

冠出版社聞知而主動來洽支持，一切編務悉由三三集刊負責，不予任何干預，版稅則提高一倍。”¹其中對辦刊過程的描述，足見這群青少年的青春熱情。

從整體風格而言，三三群士的創作是對“張腔”“胡說”的繼承和發揮。首先是胡蘭成文化理論對三三群士創作的統攝。“胡派學說講的是天人革命，詩禮中國；儒釋兼備，卻又透露嫵媚嬌嬈之氣。有趣的是，儘管胡蘭成寫得天花亂墜，總有個呼之欲出的張愛玲權充他的繆斯。‘三三’諸子中，兼修張、胡兩家而出類拔萃者，當然是朱天文。”²胡蘭成說朱天文與張愛玲不但都是大學三年級，“兩人相像的地方是一個新字，一個柔字，又一個大字。而且兩人都謙虛，張愛玲肯稱讚蘇青的文章與相貌，朱天文亦看同輩的作品……。還有在事物上的笨拙相像。兩人的相貌神情也有幾分相似，文章也有幾分相近。”³另外，也提到仙枝這一筆名，也是胡蘭成為她取自蘇軾的名句“別有紅塵外，仙枝日月長”。⁴這些給朱天文、朱天心、仙枝眾弟子巨大的壓力，一直以張愛玲為模仿甚至超越的對象。1995年，朱天文以《荒人手記》獲得華語文壇一致讚賞，在接受訪問時候，她說自己十年不讀張愛玲，以前總覺得她是無法超越的偶像，“今天看看，感覺自己好像可以平了。也

¹三三群士：《三三注》，收《三三集刊》第25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頁。

²仙枝，《序言》，收《好天氣誰給題名》，臺北：三三書坊，1979年版，第1頁。

³胡蘭成：《來寫朱天文》，收《中國文學史話》，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83頁。

⁴王德威：《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與“張派”作家的超越之路》，收《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51頁。

不是平，是總算可以不同了。”¹可見在其創作生涯中，朱天文無意識中也在跟張愛玲較勁。仙枝（林慧娥）曾說“於淚眼中思省過往的二十年是父母所生所養，往後八年卻是幸得蘭師點化才知此身立世的可貴可喜”。

胡蘭成的專著中對“三三諸人”影響最深的是《中國文學史話》。仙枝曾經撰文道：“李磐先生是讀書人，寫文章時卻無書。……書桌上單單是一本航空信紙，一枝藍色原子筆，或偶爾從外頭摘來的一束路邊花插在陶瓶裏，每天寫過一千多字，約集一章的份量，便先航空寄了來，於是《中國文學史話》就一點一描，一勾一勒地成象成形了出來。天文說人家寫史話一類的文章，大多循跡而行，考古似地追蹤考據，李先生的史話卻是自己蹣了步子，要讀者依跡而往求之，是開天闢地呢。君子言必有典，而李先生是與中國的古人今人皆生自天，所以講中國文學史可以如此無隔。我與天文讀時，啊！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呵！一邊兒欣喜，又要一邊兒頓足，知得太晚了！”²“自民初五四以來於今六十年，文壇皆是據西洋文學來評論中國文學，有多少傲慢無知，彼此鬥爭，如禪語腳下草深數丈，骷髏遍地無人知。今李先生此書也不與人爭，而只讓中國文學自己出來說話，就自然都澄清了。讀此書使人覺得自己亦要對天地是智者，對中國是情人。文章是智者之言，而亦是情人之言。”³而最能直接表達李磐（胡蘭成）與“三三諸人”關係的是十年後朱天文之言：“以上是胡先生于民國六十六年夏天於僑居地日本寫完的《中國

¹朱天文：《如何與張愛玲劃清界限》，《中國時報》，1994年7月17日，第7版。

²仙枝：《序》，李磐：《中國文學史話》，臺北：三三書坊，1980年版，第3-4頁。

³仙枝：《序》，李磐：《中國文學史話》，臺北：三三書坊，1980年版，第5頁。

文學史話》。因胡先生在臺灣授課的學生中多有青年寫作者，故著此作勵教激志，且援彼等青年的作品為例多做說明，其背景如此。”¹ 在這本著作中，不到十萬字的《中國文學史話》中，對仙枝、朱天文、朱天心和袁瓊瓊的評價竟共有八十多處，如此提攜未成名的作家少作，胡蘭成的護犢之心可見一斑。不過聯繫胡蘭成當時落水狗般的生活際遇，我更願意把他的提攜行為看作心中文學理想的印證與實現。以朱天心為例，她連載於“三三集刊”的《擊壤歌：北一女三年記》被胡蘭成盛讚“那好處是有唐虞三代傳下來的高曠清亮強大。現在是朱天心的《擊壤歌》有這個”；² “《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裏的，與朱天文《青青子衿》裏的對世人世事與物的無差別的善意，就是文學的絕對的境地”，³ 讚譽之辭溢於筆端。

張愛玲是胡蘭成的前妻，雖然 1970 年代張愛玲另嫁他人並定居美國，胡蘭成也旅居日本，老死不相往來，但胡蘭成在臺灣的影響力多少與張愛玲有關係。從胡蘭成的自戀文字來看，無論他如何天花亂墜地說張愛玲和他之間的文學理念的相互影響，⁴ 都改變不了胡蘭成消費張愛玲的文學史事實。平心而論，除了張愛玲自身模糊的政治立場之外，胡蘭成的漢奸身份和所發表的與張愛玲相關的言論，在將張愛玲推入“反動作家”的陣營中。像“有人說張愛玲的文章不革命，張愛玲文章本來也沒有他們所知道的那種革命。革命是要使無產階級歸於人的生活，小資

¹朱天文：《編輯報告》，收胡蘭成，《中國文學史話》，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 年版，第 2 頁。

²李磐（胡蘭成）：《中國文學史話》，臺北：三三書坊，1980 年版，第 95 頁。

³李磐（胡蘭成）：《中國文學史話》，臺北：三三書坊，1980 年版，第 145 頁。

⁴胡蘭成：《民國女子》，收《今生今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 年版。

產階級與農民歸於人的生活，資產階級歸於人的生活，不是要歸於無產階級。是人類審判無產階級，不是無產階級審判人類。所以，張愛玲的文章不是無產階級的也罷”¹，另外，胡蘭成的一些說法，如“所謂左傾文學與右傾文學，我本來不贊成有這樣的區別，文學是只有好壞的區別的。無產階級文學尤其是廢話。歷史上可以有無產階級專政，然而不能有無產階級的機器或無產階級的生產力，卻是社會的機器與生命力，也沒有無產階級的文明，卻是人類的文明。……文學與其他藝術一樣，它是批判階級的，不是被階級批判，它是人類的，不是階級的。”²“專制使人變成冷嘲，所以只能有魯迅，不能有彌衡。鸚鵡洲有彌衡祠，一次黃昏時候我經過，聯想到魯迅，把兩人比較，覺得魯迅還是工於心計，而彌衡是沒有心計的。”³再之其文化漢奸的身份，使得這些語句簡直就是在言論上捆綁張愛玲，拖其下水。

從整體創作主題而言，三三群士的創作是反共立場與文化中國相結合的雙重文化理念。反共色彩是三三群士作品的重要特色：“我們三三同仁要用功寫文章，要用功理論，因為最高的情與最高的知乃是同一事。我們的師是國父，昔人說‘見與師齊，損師半德，識過於師，方可傳授’，我們為達成國父的未竟之業，必要明白無疑的曉得如何對處現實的形勢與事件，在理論上與實行的方法上，我們無時無刻不可忘記要

¹胡蘭成：《張愛玲與左派（1945）》，收《亂世文壇》，香港：天地圖書，2007年版，第31頁。

²胡蘭成：《左派趣味（1945）》，《亂世文壇》，香港：天地圖書，2007年版，第118頁。

³胡蘭成：《中國文明與世界文藝復興（1945）》，《亂世文壇》，香港：天地圖書，2007年版，第186頁。

教育自己，與教育青年，不要動輒就來說大眾，而是要教育出對大眾有指導能力的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青年，自數人至十人百人千人。有了數十人、數百人，就可以看時代參加大陸人民與共軍的反共起義。若有千人以上，光復大陸時就可分派到全國各地指導政治及產業的新做法與復興禮教，再建中國文明的同一生活樣式。”¹三三集刊（第十四輯）上曾經刊發了時任臺灣“國防

部”總政戰部主任的王昇²的《提筆上陣 迎接戰鬥》，這篇反共文章中提出了一大堆不著邊際的口號，如“什麼叫做新文藝？這個‘新’是不是從來沒有看過的叫做‘新’？是不是別出心裁搞幾個花樣叫‘新’？不是的。那麼什麼叫做新呢？最好的就是最新；最符合倫理、民主、科學的就是最新；最能切合共同需要的就是最新。國軍的新文藝運動，就是朝向這個方向去努力的，我們希望這個運動既要萬紫千紅、多彩多姿，又求真、求善、求美。”³“因此我們除了加強武力的戰鬥，極有必要

¹《三三集刊》第 24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9 年版，第 251 頁。

²王昇（1915-2006），江西龍南人，畢業于陸軍軍官學校，1943 年贛南時期即追隨蔣經國，1948 年又在上海協助蔣經國管制經濟，輔助“反貪打老虎”。王去臺灣後，曾任政工幹校校長、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等職，並躋身國民黨中常委，進入權力核心，主持反統戰組織“劉少康辦公室”，權傾一時，勢力滲透臺灣員警、安全、調查等機構，對臺灣社會的言論、文化、新聞、保防等均有極大掌控權，外界曾以“地下行政院”稱之；後因“江南命案”調任“駐外大使”。晚年出任臺灣“促進中國現代化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肯定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

³《三三集刊》第 14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35 頁。

加強文藝戰鬥，我們的新文藝，是以愛為動機，以仁愛本位的文藝，也就是民族文藝，……我們需要真理，三民主義就是真理，我今天敢大膽說，世界上你要講解決民族問題，我們的民族主義是最完美的，它首求國內民族平等，再求國際地位平等，還要救世界上的弱小民族，我們的民權主義，也是世界上最全美的主義，講革命民權，講主權在民，講均權制度，講權能區分；再談到經濟：資本主義的經濟，已經在那裏修正；共產黨的經濟更是死路一條，如果世界有個正確的方向的話，除了民生主義以外，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¹在這篇講話中，包括很多重要的刊登文章，如馬叔禮《上王上將書》（第 11 輯）、郭為藩《民族主義實踐的要務》（第 18 輯）、謝延庚《從政治潮流取向看三民主義》（第 22 輯）等等，都凸顯的是一種政治實用主義，充斥着冷戰思維，這種表面的實用主義色彩和臺面下的強勢控制本質就是蔣經國時代威權統治的主要特徵，也是我們討論 1970 年代後期臺灣文學的基本認知背景。

三、胡蘭成文化理念失敗的內外原因分析

從 1947 年“二·二八事件”之後，臺灣進入了世界上歷時最長的戒嚴時期，直至 1987 年解嚴。而 1970 年代末更是臺灣史上風起雲湧的時期，隨着蔣介石的去世（1975）、中美建交（1979）、美麗島事件（1979），國民黨在臺灣的威權統治正處於劇變和鬆動之中，畢竟“從時序上劃分段落，或許可以從一九六九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開始，因為他標誌着‘蔣經國時代’不可避免的終將到來；至於它的結束，則毫無疑

¹《三三集刊》第 14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49 頁。

問的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中’美斷交。十年臺灣，十年坎坷，而我們以及我們的今天都是從這裏長大的。”¹長期以來，朱天文、朱天心等三三群士被其他臺灣作家視為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下的文學群體。朱天心回憶起被認為“御用文人”或“國民黨”的打手，至今仍覺委屈。同為三三群士成員的謝材俊說：“鄉土論戰，我和朋友從純文學這邊很奇怪的變成純國民黨的這一邊，至今清白難複——誰曉得在漏洞百出的文學意見和天真浪漫的作品背後，藏着那麼大的政治、民族覺醒加權力意識呢？”²從所刊發的文章而言，三三集刊中大量的刊登軍中文藝作品，確實有迎合國民黨文藝政策

的嫌疑。如第八、九輯連載的《劍門》（1978）就是典型的軍中文藝作品，曾經獲得第十三屆國軍文藝金像獎中篇小說銀像獎。第一段就把矛頭直指海峽兩岸的軍事對峙，涉及到兩岸對抗時期的“劍門艦事件”。³如果熟悉台海歷史的話，這部小說所描述的故事完全是造假，它設置了“劍門艦”沒有被擊沉，而是由“鎮南艦”營救成功的虛構結局。小說

¹楊澤：《七十年代理想繼續燃燒》，臺北：臺灣時報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18頁。

²謝材俊：《昨日的雪而今何在？》，收楊澤編，《七〇年代懺情錄》，臺北：時報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頁。

³劍門艦事件：“劍門號”原系美國“海鴉”級艦隊掃雷艦，由美國於1965年4月交給蔣介石集團。1965年8月5日，汕頭水警區東山島金剛山觀通站雷達觀測到臺灣東營港84海里處，有“劍門艦”和“章江號”混在商船中，向我沿海地區襲來。當晚發生激戰，8月6日凌晨“章江號”“劍門號”先後被擊沉。此役歷時3小時43分鐘，擊沉國民黨獵潛艦2艘，擊斃國民黨海軍艦隊少將司令胡嘉恒等170餘人，生俘“劍門艦”艦長王蘊山等34人。“八·六海戰”是新中國成立後規模最大的一次海戰，對臺灣國民黨海軍是一次沉重的打擊，標誌着國民黨海軍在臺灣海峽的軍事優勢已成為過去。

結尾部分：“……國軍已向內陸推進了。七天來，我們勢如破竹，與大陸內部反共力量節節呼應。海軍除了已掌握了制海權，更進而封鎖了大陸沿岸及長江口——永彬，你們是首功，恐怕你們都不知道自己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你們單艦欺敵行動把敵主力誘散，我們各個擊破，奇襲作戰順利的成功了——迅雷演習實際上就是真正的反攻登陸實兵行動。”¹這一段中的所謂「單艦欺敵」、「掌握了制海權」等等說法，足見這是一篇罔顧歷史事實的訂制之作，讓人感覺到文學被極端政治化之後的造作與噁心。第十輯陳萬軍《種火行動》（1978）是“國軍金鷹獎中篇小說金鷹作”，故事內容滿含着冷戰政治：“《種火行動》這小說的主幹，是描述中共的一個軍區司令員，於臺北和一個神秘的政治領袖共商並執行一項軍國大計的高度機密的‘種火行動’，故事經過則從參與的幾位空軍軍官，分別辭別其高堂父母、待產妻子、乃至單戀的女友，駕駛一架神秘‘怪機’潛入中國大陸，歷經險阻艱辛，傷亡流血，悲壯犧牲，終而完成一項將可使大陸一夜變色的天大的任務。”²這類作品還有第 11、12 輯連載的汪洋《春蠶到死》（1978），這篇反共小說肆意抹黑共產黨抗日軍民，在一些歷史書寫上不尊重史實，如為國民黨對日投降政策開脫，“中央也有苦衷，不得不安撫他們，不然的話，兩面作戰，那是兵家大忌，他們是乘機全力擴張勢力”，更過分的是，虛構抗日軍民策應日軍，幫日軍解圍的情節。這些作品中關於反共文學的描寫讓人感到其中濃厚的敵對情緒。

其次，朱西寧的對基督教教義的文學化理念和軍中作家的文學身份

¹《劍門》，《三三集刊》第 9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156 頁。

²魯麥：《天啟的種火行動》，《三三集刊》第 10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38 頁。

對“三三群士”的創作有着重要影響，也使得胡蘭成的理論與朱西寧所推薦發表的文學作品產生了相當的距離，分散了踐行胡蘭成文藝理論的作品的篇幅和影響力。朱西寧一直到第 13 輯才公開自己與基督教信仰之間的關係，那就是刊在這一輯中的孫文《致中國基督教青年書》，其中認為基督教能夠讓“今中國人民即由散沙而漸結團體，……諸君既置身于此高尚堅強宏大之團體，而適中國此時有倒懸待救之人民，豈不當發其宏願，以此青年之團體而負約西亞之責任，以救此四萬萬人民出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乎？中國基督教青年勉旃！毋負國人之望。”¹緊接着的第 14 輯指出“三三”的真意：“對此，兩位先知先覺的偉人已留下中國基督徒（非西洋化的中國基督徒）的榜樣，足為範式。故也不必顧慮已經式微，已經無能的西洋化教會的霸道、專權、排他等無明的將行於中國。西洋化教會的低文化，一向是，也斷乎是不足凌駕中國的高文化。這也正是以三位一體真神為樂，為能力，以三民主義真理為體，為方向的‘三三’所抱持的大信。”²加之朱西寧“軍中三劍客”的身份，特別是一直發表軍中文藝，其中很多對抗思維，不只是分掉了三三集刊的大量篇幅，同時也使得三三集刊蒙上了政治上歸屬國民黨主流文學的色彩，如陳萬軍的《天之驕子》曾獲得國軍文藝金像獎長篇小說獎，他是三三集刊《種火行動》（第十輯）、《霹靂塔》（第十四輯）的作者；履彊的《水勢》曾獲得長篇小說銀像獎，他是三三集刊《阿暉先生及其他》（第一輯）、《雨夜》（第四輯）、《卜居》（第七輯）、《戰士手記》（第十一輯）、《驚豔》（第十三輯）的作者；馬蹄鐵的中篇小說《生死場》曾

¹ 《三三集刊》第 13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227 頁。

² 《三三集刊》第 14 輯，臺北：皇冠出版社，1978 年版，第 22 頁。

獲得長篇小說佳作獎，他是三三集刊《夜來風雨聲》（第三輯）、《阿貴》（第八輯）的作者；程幻歡的《歸航》曾獲得短篇小說銀像獎，他是《喜相逢》（第四輯）的作者，還有汪啟疆的《給我們中國的兒女》曾獲得短詩銀像獎，他也是三三集刊第八、九輯連載的《劍門》的作者。如果說胡蘭成的文化保守主義是民間文人的立場，那麼朱西寧的身份就頗具官方文藝的本色，從三三集刊的內容來看，官方意識壓倒民間話語的痕跡也是相當明顯的。

還有一點是，“三三”本身的青春校園文學對胡蘭成文學理念的稀釋。如朱天心的長篇連載《擊壤歌：北一女三年記》，講述的是臺北第一女子高中女生小蝦的中學故事，同題材的還有蔣曉雲的短篇連載小說的《宴》三部曲、謝材俊連載於第 1-2 輯的中篇小說《嶺山雁字》（上、下）等等，都是校園文學的代表。另外，在《日出東南隅》（謝材俊）可見被服廠的眷村生活，《守著陽光守著你》（丁亞民）中回憶的是眷村童年生活，等等。這些情感真摯的現實生活書寫，沖淡了胡蘭成乾巴巴的文化理論，形成了臺灣文學歷史上最具有特色的青春文學團體。

總而言之，“三三時期”的結束，一方面是因其精神導師胡蘭成遠走日本，並在 1981 年 7 月去世。另一方面因是胡蘭成的禮樂中國，以及三三集團的夢想，與現實中的臺灣相距太遠。政治上的劇變，如 1979 年台美斷交，隨後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文化上的鄉土文學的興起、1975 年校園民歌興起、1977 年的鄉土文學論戰，這些現實社會處境，都在衝擊三三集團的生存。就這樣，在劇變的新時代浪潮衝擊下，三三群士曾經的文學理想，慢慢被推到歷史的暗處。

結語

毋庸置疑，《三三集刊》的誕生和發展是胡蘭成一手扶持的。王德威認為胡蘭成在臺灣與三三諸子的接觸，“在《三三集刊》這個社團裏，一群青年男女就跟着胡老師吟哦禮樂、遐想日月江山，想像有朝一日以王師之態回到中原，建立他們的禮樂中國。這個禮樂的江山最後到底也沒有達成。沒有，一切都沒有。才不過幾年的時光，這些當年的‘三三’少年都已經逐漸地成長，歷盡臺灣劇烈的轉變，成為所謂的‘老靈魂’。胡蘭成的禮樂方案，他的抒情大業，最後都要九九還原，劃歸到民間的、俗骨凡胎的流動癡嗔愛怨之中。”¹

三三群士對臺灣文壇的影響是巨大的，如第一輯中，吳念真的《今夜西風冷》（1977）中一開篇就是老蕭懷念河北老家，關於秋天落葉的描寫，讓人想起了十年後吳念真編劇的《暗戀桃花源》。在這一輯裏，銀正雄的《一座純真的橋——評陳雨航的〈策馬入林〉》（1977）中談到的桃花源、武陵人，也啟發了吳念真和朱天文的《暗戀桃花源》。再如，第 23 輯靜圓中的《黃春明的〈小琪的那一頂帽子〉》（1977），黃春明的這篇小說後來被改編成侯孝賢的電影，而編劇也是三三群士中的吳念真。這些都為我們重新定位三三、胡蘭成與臺灣文壇的關係，從而為研究外省第一代（朱西寧）、外省第二代（朱天心、朱天文）兩代人的創作姿態和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向。

¹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三聯書店，2010 年版，第 198 頁。

